

中国艺术史话

Zhongguo yishu shihua

中国

金陶艺术

下



辽海出版社

金 陶 艺 术

(下 册)

邢春如 编著

辽海出版社

战国、秦汉陶瓷工艺

战国、秦汉的陶瓷工艺有很大的提高和创新，陶器的日益精美和瓷器日趋成熟是它的特点，这使陶瓷用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继陶器与漆器在战国、西汉时取代部分铜器之后，在东汉晚期出现陶瓷器取代昂贵的漆器的趋势，为以后进入瓷器时代谱写了前奏。

这一时期，在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浙江、陕西、四川等地均发现密度高、规模大的战国和汉代窑址，在浙江绍兴甚至发现在同一地点上互相叠压了5座战国时期的窑址，说明陶瓷业的繁荣。春秋时窑炉已由传统的圆形馒头窑发展成长形的蛇窑，战国时从山西侯马、河南洛阳、河北武安等地的窑址看，窑炉规模比春秋有很大提高，秦代比战国又有提高，从咸阳秦陵兵马俑坑遗址看，秦代窑体比发现的战国窑体大四、五倍，且窑床倾斜，前高后低，目的使受热均匀，烧成后不至于前倾变形，解决了烧制大型兵马俑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汉代更出现类似近代的大型龙窑，容积增加到10米²左右，烟道增加为三个，使炉温高，受热均衡，为瓷器的烧制成熟创造了条件。

陶瓷的生产管理上，官营工场，私营作坊，及个体窑场同时并兴，陶器上普遍流行铭文戳记，如战国官营工场的陶器上刻有“相邦”、“守相”、“左陶户”等字铭，私营作坊

的陶器上刻有“文牛陶”、“陶午”、“栗疾已”等人名，秦代陶器刻有“咸亭”、“蒲里”、“咸阳”、“新安”等表示产地和工匠姓名的字铭，汉代的陶瓷器有“宫疆”、“宫屯”、“宗正”、“都司空”、“邯亭”、“陕亭”等，还增加了吉祥用语作字铭。

陶瓷品种，日用器仍以灰陶为主，新创烧的有暗纹陶及主要用作明器的彩绘陶和铅釉陶。南方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在战国得到发展，而在东汉晚期使青瓷的烧制趋于成熟。在陶瓷品种增多的同时，装饰方法也丰富多彩起来，日用器有印纹、划纹、堆贴等，明器有堆贴、彩绘、雕镂等。总的看来，日用器简朴，明器华丽。这时期取得突出成就的还有陶塑和建筑用陶，建筑陶器属于陶瓷工艺，但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建筑工艺关系也相当密切。

灰陶

日用器以灰陶为主，除灰陶外、红陶、黑陶、夹砂陶也有一定比重。炊具有釜、甑、鼎、甗等，饮食器有杯、碗、钵、盘、豆常成套出现，如河北石家庄市郊出土了战国时代的成套饮食器具，陕西出土了釜甑等夹砂陶炊具，四川出土的陶壶，呈喇叭口椭圆腹平底，肩部斜出有直流，造型别致优美。秦汉时灰陶应用更广，类型变化多样，形成不同特色。秦代制陶业以关中最盛，造型庄重，出现一些具有特殊风格的品种，如蒜头壶、茧壶等。汉代有豆、筒杯、钵、盘、二勺、小壶、扁壶、缸、釜、甑等，制作精良，造型优美。日用灰陶器的装饰风格多趋于简朴，主要为刻划纹，有篦

纹、网纹、绳纹、弦纹等。

暗纹陶

暗纹陶也称研花陶，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兴盛，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制作时在陶坯未干时用圆钝光滑的工具在器壁上轻力研画成各种纹样，利用研画部位密度增大形成一定肌理效果的暗纹，烧成后，暗纹仅在光线成一定角度时才隐约可见。暗纹陶多用细泥制成，胎质偏黑，装饰纹样主要有弦纹、斜格纹、齿纹、栉齿纹、波纹等。

暗纹陶益（河北平山出土）形饰新颖，堆塑有小鸟、小兽和人物，并有盖钮、环耳、器足等。郑州二里冈、洛阳烧沟、山西侯马、山东临淄等地的战国墓均有大量暗纹陶出土。

几何印纹硬陶

几何印纹陶在我国南方的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战国时，由于胎土含有氧化铝，烧成温度更高，达 1200°C 左右，烧成后胎骨坚硬，多呈紫褐色。战国时的几何印纹硬陶仍以泥条盘筑成型，多为容器。罐、坛、钵、杯等多见于江苏、浙江；甗、壶、缸、瓮等多见于两广。拍印出的纹饰主要有米字纹、方格纹、回纹、栉齿纹、圆珠纹、篾纹、波纹、编织纹、布纹、筛孔纹等，在器物的肩部常划出细密的波浪纹。总的看，小件细密，大件粗犷。

彩绘陶

彩绘陶主要作明器用，虽最早见于春秋，实际流传于战

国、秦汉时期，彩绘陶的兴起与当时的厚葬风气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新制度的建立，社会处于上升阶段，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提高，尤其上层统治阶层，对生活充满信心，生前寻求长生不死之方，死后依然要保持生前的一切。所以，这时的明器大都仿造生活中的日用器型，彩绘陶除仿自日用陶瓷器外，也有仿造当时的铜器、漆器造型。战国时彩绘陶的造型有鼎、敦、豆、壶、簋、篮、碗、盘、杯、匜、盒、罐等，汉代有壶、盒、盆、盘、杯、奩、炉等，其中以壶最多。

彩绘陶虽仿自生活日用器，但作为明器，毕竟只为看而不为用，所以它的烧成温度很低，烧成后一般要施一层黑色陶衣，再刷一层白底，然后进行彩绘，彩绘后不能再经水和拿用。彩绘陶的装饰华丽，多用色鲜艳，绘制精美，战国时主要用黑线红绘，个别也有用金银勾线的，汉代色彩较丰富，除红、黑、白、金外，还辅以绿、灰、黄、橙、青、褐等多种色彩。

彩绘陶在纹样的构成与绘制上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那变化丰富的形式和熟练流畅的线描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研究。战国时，纹样以几何纹为主，有涡纹、三角纹、矩形纹、方连纹、水波纹、之字纹等，其他有云纹、龙凤纹、鸟兽纹。汉代以几何纹、云气纹、动物纹及人物纹为主，多组成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或适合纹样，注意在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的形式，如在器盖多用有规律的适合纹样，在器腹部多由几何纹组成的带状纹样作有节奏的分割，中间穿插富有动

感的云气纹或动物纹。纹样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绚丽流畅，气势奔放。

彩绘陶的实物在河南洛阳、湖南长沙、陕西西安、河北邯郸、山西长治、山东文登、甘肃张掖以及广东、辽宁等地均有大量出土，其中仅洛阳烧沟一地就出土彩绘陶近 800 件。典型作品如“彩绘陶壶”（洛阳烧沟出土），整器由几何纹装饰带分隔构成，腹部主纹区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追逐于云气纹中。“彩绘鹭鱼陶盆”（河北满城出土），中心画有白鹭捉鱼，红色弦线组成圈带，外部五鱼追逐，纹样生动别致。

铅釉陶

铅釉陶也是主要作明器用的陶器，在西汉时创烧成功，汉宣帝以后兴盛，开始主要流行于北方的关中和关东地区，东汉后普及到湖南、江西及西北、东北等广大地区。这里一种以铅化合物为助熔剂的低温釉陶，在 800 度左右的氧化气氛中烧成，含铜呈翠绿色，含铁则呈黄褐色或棕红色。多为翡翠般的绿色釉层，清澈透明，薄薄地覆盖在器面上，釉面平滑光亮。有时由于长期埋在地下，出土后釉面泛出银色光泽，故又称其为银釉陶，汉代南方烧制的铅釉陶，火度比北方高，釉层较硬，所以又称北方为软釉，南方为硬釉。

铅釉陶实物较多，由于作陪葬用，有做成奁、盒、炉等日用器型，也有做成灶井、磨盘、圈仓、作坊、楼阁及各种动物造型的。如“绿釉陶壶”（山东高唐出土），“五层陶塑楼阁”（甘肃武威出土）等。

原始瓷与青瓷

早在商代就已烧成了釉陶和原始瓷，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种，但两者的发展又是紧密相关的，其共同点是都着釉。釉陶是泥质胎骨，烧成温度不超过 1000°C ，原始瓷则已采用高岭土做胎骨，烧成温度在 1200°C 以上。之所以要冠以原始二字，是因为它还处于瓷器的萌芽阶段，还不能称其为成熟的瓷器。原始瓷发展到战国，产量与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其用料精细，器型规整，通体施釉，由于烧成温度接近，常与几何印纹硬陶同窑烧制。

原始瓷的主要生产地仍在浙江、江苏一带，同时也延及江西、湖南等地，但烧成质量不及浙江、江苏。浙江绍兴、肖山等地出土不少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品种有碗、钵、杯、盘、罐、匜、孟等，江苏吴县战国墓也出土盘、罐、孟、尊等器物，吴县的原始瓷，釉只施于上部，釉层中有凝聚的芝麻点晶体，釉色黄褐、黄绿，以铁为呈色剂。原始瓷的装饰风格与日用灰陶器一样，极为简朴，器物或素面或饰以简单的篦纹、波纹、齿纹等。

原始瓷发展到汉代，取得很大成就，到东汉中期已达到完全瓷器的阶段，由于以铁为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被称为青瓷。

青瓷在东汉时期的烧造遍及各地，浙江、江苏、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川、贵州等地都有出土，浙江是青瓷烧造的中心，在上虞、余姚、宁波、绍兴等地，发现大量窑址，使用规模很大的龙窑，烧成温度达到 1300°C 左

右。汉代青瓷器多胎质灰白，釉薄而匀，施釉常不到底，由于烧成温度高，瓷化程度好，扣之清脆悦耳，有金石之声。品种有甗、罐、盂、钵、碗、壶、洗、杯、炉、灯等。釉色多为灰绿或绿中泛黄，纹饰依然简朴，有弦纹、小波纹、圆珠纹等。

除青瓷外，1972年在浙江上虞，宁波等地的东汉窑址发现早期黑瓷，其他在江苏、安徽等地也有发现。胎色深灰，釉层中因含铁量高，烧成时由深褐而到漆黑。品种有罐、壶、甗、等大件，也有碗、洗，造形纹饰与同期青瓷相似。这一发现之前，最早的黑瓷是在东晋时才有出现。

陶塑

陶塑是陪葬用的明器。前已述及，战国、秦汉盛行厚葬，在陪葬的明器中，一部分是生前享用的日用器，如铜器、漆器、陶瓷器、丝织品，衣服等，这些都可以直接放入墓室中。而在奴隶社会结束后，用活人、活畜殉葬的习俗已被废除，生前享用的建筑、奴婢、家畜、车马等改为制成模型来进行陪葬，人物模型称为俑，俑主要做成陶塑，也有用木雕的，这就使战国、秦汉，尤其是汉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陶塑。这些陶塑，一方面和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雕塑艺术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秦汉的厚葬之风，波及朝野上下，上至皇帝及官僚贵族们的大型陵墓，下到中小地主及平民百姓的小型墓葬，从中出土的大量陶塑，为我们展示了一批丰富多彩的雕塑群，成为研究古代历史与文化艺术的珍贵资料。

陶塑主要是素烧的红陶器，也有烧成后再进行彩绘，汉代以后还以铅釉陶烧成各类陶俑。

战国时期的陶塑，有各种人物和动物造型，郑州二里岗的战国墓中出土两只陶鸭，足、尾、翼都可以拆开，并施以彩绘，制作十分精巧。

秦代陶塑以秦陵兵马俑为典型代表，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先后发掘了三座陪葬的兵马俑坑，其中各类武士俑达七千件之多，另有战车、战马各百余件。这些陶俑陶马塑造得和真人真马一样高大，如此庞大的雕塑工程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将军俑、铠甲俑、战袍俑等一律身服袴褶，上身战袍齐膝，下生长裤缚腿，足登方口齐头履，按职务的不同披挂不同铠甲，个个威严挺立，气宇轩昂。形象刻划的重点放在面部，传神之外，体现出陕西关中地区人所特有的剽悍形象，神情、五官、发饰的塑造都极注意每件作品的个性。战马都刻划得膘肥体壮，前肢挺立，后腿如弓，筋骨见劲，势如临战。

兵马俑由于体型庞大，制作时采用模塑结合，陶俑、陶马的头、身、腿都在分模制作后进行粘接，有的是先烧后接，如陶俑的头和身躯。大多是先接后烧，如此大型的陶塑在烧制时要做到不裂、不变形而且要求火候均匀并保持一定的高温，这些都反映秦代烧窑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汉代陶塑在题材涉及生活之广和艺术处理手法之新上有突出的成就。题材上，人物有文俑、武士、胡俑、侍仆、侍女、舞俑、乐俑、杂技俑、侏儒等。动物有马、牛、羊、

猪、鸡、鸭、狗、龟、鱼、蛙、鸟、猴、象、鹿等。器物有灶、井、车、船等。建筑模型有厨房、磨房、仓库、城堡、楼房、猪圈、羊圈等。其中楼房又有曲尺式、干阑式、重楼、水阁等多种形式。

艺术处理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形神兼备，在传神的基础上追求栩栩如生的写实效果，人物和动物的形体结构，各部分的比例都刻划得十分准确。典型作品如四川成都、河南辉县等地东汉墓出土的一批动物陶塑，有狗、马、羊、猪、鸡、鸭、鹅等。狗的警觉，羊的温顺，马驹的活泼调皮被刻划得惟妙惟肖。另一种倾向是以刻划人物的动态、神态为主，忽略形体的比例结构，甚至有意对形体作夸张变形来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典型作品如四川成都出土的“说唱俑”，山东济南出土的“彩绘乐舞伎群俑”。其中说唱俑以极其生动的神态和动态一下子把观众吸引住，给人一种淋漓痛快的艺术享受，慢慢的你才会感到他的头与躯干、四肢的比例结构都作了夸张的不经意的变形，这些变形更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

四、六朝金属与陶瓷工艺

六朝金属工艺

六朝时代的金属工艺，以铜、铁、金、银为主。由于战争影响，冶铁发展，大量用于兵器以及农具。随着佛教兴盛，铸铜造像兴起，工艺制品远不及秦汉，在冶铁铸造和工艺技巧上颇有发展，尤其是将金属工艺与佛像艺术相结合，有雕塑家直接参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制铜工艺

日用铜器减少，尚有铜盘、铜洗、铜奁、铜炉、铜灯、铜熨斗、铜鍬斗等。多数承袭汉代传统。“三足铜盘”、“铜洗”（宜兴周墓墩出土），晋代太康年间物品。另有小“铜鼎”（宜兴出土），“博山炉”较多。（无锡、南京、苏州、芜湖、福建、四川都有出土）。铜镜、钢印仍然流行，并有新的特色。铜佛像是新品种而更加精彩。

1. 铜镜

铜镜是常用品，晚期的较为精美。铸作纤巧，图案工

整，流行纪年铭文。多为专门铸造。有“袁氏”、“尹氏”、“刘氏”、“李氏”；“黄龙元年陈世造”，“天纪元年徐伯造”等。反映了私人生产和商品性质。绍兴、扬州一带为铸造中心。

装饰纹样，多用浮雕手法。三国两晋承袭汉镜，南北朝时有了新内容。常见的有龙虎纹、翔鹤飞鸿纹、十二生肖纹、四神纹以及天王日月、西王母、羽人、人物礼佛，画像、车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还有八卦纹，宝相花、葡萄纹、花草纹。有的赋予新意。回文诗铭发展，别具一格。典型有：“龙虎镜”，龙虎对列，龙为兽形一角四足粗身细尾，与虎形相称。“翔鹤飞鸿镜”纽座常以动物肢体一部分组成。以单独飞翔的仙鹤、鸿雁为装饰，有清高寄远之意。“十二生肖镜”，是最流行的纹样装饰。最突出的是“伍子胥画像镜”（上海博物馆藏），由绍兴铸造，镜背画面分为四区，分别为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侍女等浅浮雕人像。边饰锯齿，弦纹、波浪纹。铜镜画像表现重大历史题材，还是首见，反映了当时人对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伍子胥的怀念。另有“葡萄海马镜”，是民族交融中形成的新纹样。用镂空细部的办法把马蹄关节镂成小孔，以见纤巧。较为特殊的是回文诗镜，如“娇来回文镜”铭文：“团团宝镜，皎皎升台，鸾镜自舞，照日花开，临池似月，睹貌娇来。”正读反读铭词隽永而靡丽成韵。意境形象趣在其中。还有“灵鉴”镜也称鉴，铭曰：“美哉灵鉴，妙极神工。明凝积水，净若澄空，光涵晋殿，影照秦宫，防奸集祉，应物无穷，县

书玉篆，永镂青铜。”文词俊美而形容详实。与汉镜颂祷吉语不同，加强了文学艺术性。六朝靡丽文风可见，审美情趣随时代而有特色。

2. 铜印

承汉代而发展，早期出现新的格调。三国魏印、官印袭汉风隶篆平正端严，私印揉秦汉而略变，“悬针篆”是其特色。布局构成重心偏上，上实下虚，尾划略长如悬针下垂，字体瘦劲清秀，别具一格是个创造。例如“樊缵”、“曹氏印信”。晋印，又复兴汉印形体，作工严整。北朝印也袭汉印体。但多应时雕凿刻用，而有新风。又称“急就章”。不太规格而作风泼辣，更具刻写味道。这一时期的印钮，有龟钮、驼钮、辟邪钮、马钮等，后三种为新出形式。

3. 铜像

铜像铸造在金属工艺中是最出色的新品种。佛教兴起后金、铜大量用于佛事，尤其是铸造佛像，晋及南北朝普遍发展。在制铜工艺史上是个突出的转变。洛阳迎佛日，各庙宇有金铜佛像，车载游行，称为“行象”，多达三千余尊。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时（466~471），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用铜十万斤黄金六百两，高四十三尺”。南陈宣帝陈顼（569~582），“铸造金铜像二万躯，修治旧像一百三十万躯”。制铜工艺的发展，为宗教服务的规模之大，造像之多可以想见，而且由艺术家参与。

西晋画家荀勖于太始二年（266）施造鑿金铜佛、菩萨像十二躯，其中三躯佛、菩萨像传后世，“高三尺许”（《洛

阳伽蓝记》)。最著名的是东晋雕刻家戴逵(约326~396),木雕之外,“又善铸佛像,”“范金赋彩,动有楷模。”塑铸有“佛及二胁侍菩萨像”,传世荆南。”机思通瞻,巧凝造化。”造像赋于人的性格。”所思致妙,精锐定制。”富于民族特色。其子戴颙(377~441),少年时就随父学艺,”逵每制像,常共参虑。”“巧思通神”。“宋世子铸丈六金像于瓦棺寺,像成而恨面瘦,工人不能理,乃迎顾问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既铝减臂胛,像乃相称,时人服其精思”。又修治僧人慧护于吴郡绍灵寺所造丈六释迦金像,因其形制过于古朴,便在肩以上缩短六寸,足跛以下消减一寸。“首面威相,宛然如真。”,人称其“天机神巧”,后世誉“二戴像制,历代独步。”“所造甚多,并散在诸寺”。于佛教雕塑艺术中国化过程中做出了贡献。

晋有“建武四年金铜佛像”,是早期(307)作品。“依经熔铸,各务仿佛”。仿外来形制,风格古朴。刘宋“元嘉十四年金铜佛像”(现在日本京都),是韩谦(437)施造的鍍金佛趺坐禅定像。基本外形衣饰处理承早期,造像柔丽富有表情的面目,修整符合体型与动作规律的衣纹,显示了对人物的理解,表现技巧成熟,背光富有装饰性的火焰纹,以及整个佛像与座的造型揭示了对艺术规律的掌握。形象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与戴氏造像特点相符合。北魏“太和十七年造释迦铜像”(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郭雅(493)造,雕铸立式佛像。出色的有“永平四年造弥勒铜像”(天津南郊出土),座有铭文“章武县人王零珍”,“永平四年五月”

(511) 造像人记。立像、背光、基座组成，高 30 厘米，形象符合“秀骨清象”的时尚风格。面容清癯而含微笑，神态端庄而透生动。高髻袒胸，窈窕身姿。右手示“无畏印”，前臂举起指向上掌向外，左手示“与愿印”，垂臂指向下掌向外，衣纹作水波式，“曹衣出水”略带飘举，实属“枋耘佛像”形式，为“接引佛”形象，足登莲蓬垂瓣，尖叶形火焰背光，衬罩全身，下为中空台座。肖梁“天监四年金铜佛像”（历史博物馆），原鍍金立像（505），小如手指，人称“袖珍佛像”，以小巧见称。六朝铜铸佛像伊始，有巨制有小品，多为“行象”小型。为寺庙或家庭佛龕陈设、崇拜之余不乏可赏之处。统一风格中各代自有特色。

金银工艺

金银细工在六朝时代很有发展，由于统治阶级中人争相豪奢以至“斗富”赌盛，金银器物、金银装饰流行成为风气。

三国东吴有“花形金饰”（南昌出土），雕有“大吉”文字。西晋盛行花丝首饰。“金狮子”、“金簪”、“金叶”（洛阳金村出土），金制首饰六十多种，有用金银细丝盘绕成的各种花型纹样，细致精巧，标志着西晋花丝工艺的成就，承汉代又有发展。金圈、金项针、金珠、金饰件、金块（宜兴出土），太康七年至元康七年（268~297）之物，间有宝石和水晶片等。金钗、金簪、金银石子环（南京栖霞山出土），镶嵌着琥珀、水晶、绿松石等。各式首饰制作精致。金银器具达 130 件。兽形金牌、兽形金饰件、晋鲜卑归义候

金印、晋鸟丸归义候金印、兽形饰金戒指（内蒙古凉城出土），西晋拓跋氏之物。金牌和饰件，布局造型及风格与内地大异其趣。四兽形金牌、鑿凸出来的形象，有当地动物特征。背有“猗金”三字，系属首领所用。

东晋有双鸟纹金饰、鱼形金饰、梅花金饰、镂空花金珠、（长沙出土），宁康三年（375）之物技艺高超。十六国中后赵石虎所用金银器具，制作精巧，有微如破发之细。北燕有“金冠饰”（辽宁北票出土），六只枝形项花和压印佛像纹饰的山形金花组成。另片是镂空图案，焊以金丝、金粟、嵌对眼形灰石珠。作工精细而瑰丽。南朝有金环、金珠、金戒指、六瓣花形金饰等（广西贵县、南京御道街出土），虽属小品，鑿刻雕缕颇为精巧，这一时期金银细工，以“错采镂金”的技艺著称。

铁器工艺

在金属工艺中冶铁有较大发展。在河南浍池县有一处冶铁作坊遗址和一个北魏时的铁器窖藏发现铁器达 4000 余件。多用于兵器制造和农具。由于战争年代用作军事装备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而有不少名品，足见工艺水平。

兵器中如“方天画戟”、“丈八蛇矛”、“青龙偃月刀”等，承春秋、战国、秦、汉型制。在工艺修饰上有所发展。在锻造质量上也有提高。

铠甲有三种基本型制。头盔仍用“兜鍪”。在装饰上因时因人而异。晋有“筒袖铠”，由小块鱼鳞或龟背甲片，前后连缀成筒形甲身，护肩装有筒袖。南北朝有“柄裆铠”胸